

凭窗读史



1922年从前门箭楼向外城眺望。



溥杰在自家花园内摆拍。

从达·芬奇到罗汉画

1922年5月末的一天,紫禁城神武门内,一位来自北欧的学者,正在等待一场“不被允许的会面”。

他43岁,小个子,穿着一丝不苟的深色西装,沉重的照相机片刻不离手。此行,他被批准“拍照”,却被告知不得直视皇帝,更不得与皇帝交谈。而此刻,他分明感觉到,一双眼睛在主殿窗后看着他——那是末代皇帝溥仪。

后来,他将这段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1923年4月22日的《纽约时报》星期日增刊上,题为《中国皇帝扮演摄影助手》。

这位瑞典学者汉名喜龙仁,他或许没想到,这次北京之行留下的影像,将在几十年后,成为这座古城在时代更替中挣扎的见证。

1922年的紫禁城,内廷还是禁地,为了走进这里,喜龙仁费尽心机。至于他和中国的缘分,还得从8年前的一幅罗汉画说起。

1913年,34岁的喜龙仁已是欧洲艺术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领域声名鹊起。1914年,他应邀赴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及波士顿美术馆讲学,所到之处,无不受学界的热忱欢迎。

授课之余,他也担任古董商和私人收藏家的顾问,并以收藏自娱自乐。那年春天,在波士顿美术馆,他遇到了著名收藏家丹曼·罗斯。

“这是让我泪流满面的画。”罗斯带着喜龙仁穿过走廊,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展厅。眼前是十幅中国南宋时期的绘画——《五百罗汉图》。这些画据传是周季常、林庭珪的作品,共100幅竖轴,原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1894年在波士顿美术馆展出,后被该馆买下10幅。画中罗汉或执剑击龙,或伏虎静坐,线条流畅,神态各异,与西方透视写实截然不同。

凝视罗汉画《云中示现》时,灵光闪过。他意识到,此前理解的“艺术史”,不过是西方的一段局部叙述。东方,还有一整片尚未开发的新大陆。

喜龙仁回忆说:“中国画那种由内而外,不依靠外在景象而全凭画家心灵的艺术创造力令我失神。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传统,一种我从未接触过的美学境界。”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生:放下达·芬奇,放下文艺复兴,去探寻东方。这个“顿悟”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他不懂中文,此前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

1916年1月,他开始通过纽约的古董商购买中国艺术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两个月后,又买了两幅罗汉画。一幅描绘罗汉执剑击龙,另一幅则画罗汉伏虎。购画发票上注明前者可能作于元代或明代,后者则为明代的作品。

将近40岁时,喜龙仁终于登上“真洋丸”号前往日本,开始了第一次东亚之旅。从日本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在苏州园林中,他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境;在杭州西湖边,他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原型。1918年,第一次站在北京城墙下,他被“帝国荣耀的余晖”震撼住了。

回到斯德哥尔摩,他立即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展,但这只是开始,艺术家的鉴别力必须建立在亲眼见过,大量积累之上,几个月的浮光掠影显然不够。

1919年春,喜龙仁将个人收藏的14件文艺复兴时期画作或瑞典古典主义博物馆。忍痛割爱背后,是他正在筹备一次漫长的东亚之行。这一次,他的目标很明确:中国。

城墙城门正在渡劫

1921年9月,当“太阳丸”号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时,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中文并阅读玄奘传记上。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激励着他到东方寻宝。

就在这一年,瑞典人安特生和斯文·赫定在中国考古所获颇丰,由瑞典皇室主导的东方热正在兴起。喜龙仁也卷入其中,相约与安特生的助手卡尔贝克,一起到安徽寿县去发掘青铜器。

几次碰壁后,喜龙仁的考古梦碎。但他借着这个由头,坐着颠簸的骡车,带着考古和摄影设备,过潼关,

存档古都

——喜龙仁的六次北京之行(上)

从元朝建都算起,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存在了700多年,但城墙有多长?没个准数。老北京说“前门楼子九丈九”,“九丈九”也是虚数。1922年春,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被破坏的城墙,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他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它们的人。

于是,他“一码一码地”测绘和拍摄了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如今,我们站在北京仅存的城墙城门前,或许能感到一丝庆幸——幸好,有人曾为它们留下过影像和图纸。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家,他对北京贡献良多,而人们对他却知之甚少,甚至连他的汉名喜龙仁都常常搞错。近年来,随着喜龙仁档案的数字化公开,他与北京的六次交集才清晰起来。



喜龙仁在北京拍摄城墙与城门。

进西安,游洛阳,又在杭州、南京等地转了一大圈,足迹踏过大半个中国,直到1922年3月,才再次站在北京城下。

那是一个满目疮痍却又暗流涌动的时代,北洋政府的军阀混战、列强的租界争夺,以及清王朝的最后余晖,共同构成北京的独特风貌。

从城楼俯瞰北京时,一个想法征服了他。正如他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开篇第一句所言:“我撰写这本书,是源于北京城门之美丽;源于城门具有非凡意义,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

北京城始建于元代,明代永乐年间大规模扩建,至嘉靖年间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墙由夯土芯、砖石外包构成,规模之宏大、建筑之壮观,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堪称奇迹。

喜龙仁觉得,“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墙垣,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在他眼里,北京城墙是有生命的,依季节、时辰、天气和观者欣赏标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远眺城墙,它们宛如一条连绵不绝的长城,其中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

不过,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样明显,城墙城门正在被时代吞噬:环城铁路已经开通,火车从城墙瓮城中穿行而过;瓮城正在被拆除以适应现代交通,古老的城门洞被拓宽,城楼上的琉璃瓦已经斑驳脱落;古老的城墙依然巍峨,但墙根处杂草丛生,墙体上布满裂缝,一些地段甚至被居民凿洞而居;洋建筑超

过了城墙,像是侵略者,破坏着北京的天际线。

4月,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中,喜龙仁开始了他的工作。他背着沉重的相机,手持测量工具,带着中国助手,从正阳门走到永定门,从朝阳门转到阜成门。他爬上城墙,钻进门洞,仔细记录每一块城砖上的铭文,以便弄清楚建造时间、用料、砌筑特点。

“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在城墙上留下了印迹——战争时的摧残和和平时的建设,腐朽与勤勉的政府,懈怠与积极的官员,衰败与繁荣的年代,此外还有那些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这座引人注目的防御工事的人们留下的痕迹。”

喜龙仁相信,石头和砖瓦记录了北京从16世纪以来的历史。为了解读碑铭石刻上的文字,他迫不及待地请中文老师朱殿臣帮忙翻译了相关的历史书。

或许是司空见惯,或许是学术传统,文献中很少关注到城墙的细节。比如,内城城墙长度这一关键数字,万历《顺天府志》中记载为40里,而《明史》则云45里。哪个数字更准确?喜龙仁经过近乎偏执的实地踏勘,得出了答案: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合计23720米,约47.4里。

一提到正阳门,老北京人喜欢说“前门楼子九丈九”。殊不知,喜龙仁测出的精确高度是“齐城台平面处宽为50米,最大进深为24米,通高38米”。

至于城墙的高度,喜龙仁首次测定东城墙11.10米、西城墙10.30米、南城墙10.71米、北城墙11.92米。四面城墙高度并不一致,北高南低。

在建筑学角度,他已经算是权威了。更难得的是,在阐释景观的字里行间,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再现了旧京神韵:

“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在喜龙仁的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

城墙内,是权力主导的秩序与文明,城墙外,是浪漫主义的自然景观,而门洞就成了这两个境界的过渡地带:“河岸深处,黑色的小猪在肥沃的沼泽地里翻拱觅食,孩童们则像青蛙般在芦苇丛中嬉戏;白鸭成行,在水面上划出片片水花,‘嘎嘎’地回着主人的呼唤。”这诗意又有烟火气的场景,不在别处,就在百年前的北京护城河畔。

“人们也许不时会注意到一位中等个子、朴素的中年男子,通常穿着适当熨平的棕色或深色西装,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标尺,望着一抹阴影掠过北



南宋周季常绘《五百罗汉图·云中示现》,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

平的城门或紫禁城的飞檐。”他这样描述自己。

无数个黄昏,他等着那抹阴影映照醒古建筑,才迅速按下快门。如果对场景不满意,他会一次又一次回到那里。直到光线与颜色的组合能最清晰地传达出建筑师的本意。

北京有九座内城,七座外城,每一座城门都有独特的建筑形制和历史故事,每一段城墙都承载着百年风霜,要一一尽述,谈何容易?他把每段城墙都分成一百多份,再“一码一码地”观察测量;虽然手中已经有了重修城墙城门的图纸,但还是对每个数据一一重新测量求证。53张喜龙仁手绘的建筑图纸和128张城墙与城门的照片,就是他实地踏勘的明证。

在两年的考察中,他详细记录了每一段城墙的标记、用料、砌筑特点,甚至对每一段城墙的建造修葺历史进行了考证。尽管受专业素质所限,有的城楼测绘图不规范,但他留下的这份档案,至今仍是最新翔实可靠的。要完成这些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

末代皇帝充当助手

如果说城墙考察是冷静的学术行动,那么进入紫禁城,则更像一次冒险。

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以后,溥仪还在内廷,紫禁城大部分还是皇家禁地,外人无法进入,更不用说外国人了。

他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了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庄士敦是英国人,曾在牛津大学学习,1919年被聘为溥仪的英文教师,是溥仪最信任的外国人之一。

庄士敦表示,没有权力帮人拿到前往皇宫内部的通行证,但愿意为他开具介绍信,让他拜访满族亲王贝勒们的府邸和花园。

跟今天的年轻人一样,溥仪的弟弟溥杰对摄影很有兴趣,他大大方方地在自己的花园里摆造型,让喜龙仁拍摄。

在尚未得到紫禁城的邀请之前,喜龙仁给溥杰寄了一系列照片,以示感谢。他推测,溥杰一定会把照片拿给溥仪看,从而引起他的好奇。果然,几个月后,喜龙仁收到了一个神秘的邀请。

1922年5月末,喜龙仁与中文老师

一起来到神武门前,庄士敦和两位太监迎接了他们,寒暄过后,庄士敦便抽身离开了。喜龙仁被告知,可以拍摄所有想拍的照片,“但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

就在这时,喜龙仁感觉到有一道目光正注视着他。他抬头望去,只见主殿窗下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正在观察他。

一位报信的出来,建议喜龙仁不必在某一处景点用掉太多底片,因为宫里还有许多更重要的地方值得拍。

“我很感激他的建议,便移步到毗邻的殿内……还没等我架起相机,又一位报信的跑来,拿着一款老式柯达相机,递给我问我是否还可以用?这架相机的状况非常凄惨,我只能建议把它拿到北京最好的摄影店去维修。这仅仅是个开端。几分钟后,皇帝本人就来到我身边,观察我用相机的一举一动。”喜龙仁在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

由于事先被告知“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而他是近视,只好在摘下眼镜的情况下,向溥仪演示相机的各种功能。

溥仪看得入神,突然说:“我想看看相机里面。”

喜龙仁只好把相机拆开。就在这时,接见时间到了。喜龙仁不得不把相机部件装进口袋,向皇帝叩头,倒退着向门口走去——他不能背对天子。

就在他即将退出大门时,一个声音叫住了他:“等等,我跟你一起去。”喜龙仁愣住了,他模糊地看到溥仪正从台阶上走下来。

“皇帝本人来到我身边后,开始作为宫内私家向导,指挥我往哪里走、哪些地方可以拍照。没过多久,他就完全忘了害羞这回事,主动带头选择适合拍照的景点和角度。”

“这个场景对我来说有些奇特,因为我还没有被正式引荐给皇帝,但我强烈的兴趣,他的问题和建议迅速去除了这些规矩和礼节的条条框框。”

他们一起欣赏生长了几百年的盘根错节的槐树,还爬上石堆和台阶寻找最佳取景位置。最后,喜龙仁被邀请参观了皇帝在养心殿的寝宫。

“我们在养心殿内找了个地方坐下。更多的破旧相机被呈至我面前。就如行程伊始皇帝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身边一般,他突然站起来向他的客人道别后就消失了。”

喜龙仁被带回神武门,在那里,他表露出欣赏:“我感受到了这个坐在天子之位上的可爱的年轻人生动、亲切的形象。这与我带走的那些胶片几乎同样珍贵!”

除了溥仪的支持,喜龙仁还得到了北洋政府内务部的特许。档案显示,政府曾专门委派民国大总统的一位特别助理协助他考察中南海。当时,那里是政府的办公地。

利用这些难得的机会,喜龙仁拍摄了300余张照片,全面记录了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北海,甚至圆明园的断壁残垣。

有研究者认为,喜龙仁多次讲溥仪当助手的故事,细节有出入,可能有夸张。不管是不是有杜撰,那些历史上第一次被拍摄到的建筑细节,仍表明他是不虚此行。

孙文晖